

# 從漢字文化圈看語言文字與國家認同之關係

蔣為文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 壹、前言

隨著台灣大眾之間“統獨”意見衝突對立逐漸升高，有關台灣民眾之國家認同議題在近十幾年也逐漸受到學界之重視。影響台灣民眾之國家認同的主、客觀因素很多，究竟那些是關鍵因素又其扮演何種的重要角色則因不同學者而有不同的意見。若就語言文字來看，它對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是否有影響呢？推行台灣本土語言（包含原住民語、客語及台語）及羅馬字對促進台灣民眾的台灣國家認同是否有幫助？贊成的人或許會舉韓國與越南為例，認為使用和中國不一樣的語言文字，可以確保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立；反對的人總會舉美國及愛爾蘭為例，認為即使他們使用和英國一樣的英語，仍可獨立建國。究竟語言、文字對國家認同是否有加分的效果呢？

Anderson（1991:37-46）表示「出版」、「宗教改革」和「當地母語的出頭」是近代西歐民族國家（nation-state）意識形成的重要源頭。Davies（1997:482）也指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用民族母語來創作的風氣終於促進發展出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而這是形成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關鍵之一」。

若從Benedict Anderson（1991）「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觀點切入，在漢字文化圈<sup>1</sup>裡，19世紀以前均有一種以中國為中心、透過漢字所形成的「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an imagined Hanji cultural community）。這種「漢字文化想像共同體」（簡稱做「漢字共同體」）多多少少均影響到漢字文化圈舊成員於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族想像建構。

在中國，他們利用「漢字共同體」做為近代「中華民族」或者「中國國族」的想像基礎。那些無法度跳脫漢字共同體的「壯族」、「苗族」、「瑤族」等，當然僅被當作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而沒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國家。而那些跳脫「漢字共同體」、發展出獨特語言文字的舊成員，譬如越南、韓國、朝鮮和日本，均重新建構以自我為主體的「民族國家」想像。若論到台灣，雖然於17世紀初因為荷蘭統治

---

<sup>1</sup>所謂的「漢字文化圈」是指曾經或還在使用漢字的地區或者國家，包含越南、韓國(所謂的南韓)、朝鮮(所謂的北韓)、日本、新加坡、台灣與中國等。

的關係而將台灣從原始部落社會帶上國際舞台，然而隨後來而來的鄭成功及清國統治卻將台灣帶入漢字文化圈。台灣的漢字文化特色竟於二次戰後成為中國國民黨用來建構台灣人的中華民族想像的基礎。

語言、文字雖然和國家認同沒有絕對的關係，卻有相對的關係，此關係依不同情境（context）而有所不同之依互程度。本研究試圖從漢字文化圈的歷史文化情境中探討語言、文字對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與獨立建國運動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本文指出語言文字在漢字文化圈中扮演極重要的連結角色，欲促使台灣擺脫漢字共同體舊成員而成為新的民族國家就應該將此連結切斷並建立台灣民族的語言文字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sup>2</sup>

## 貳、基本定義、概念與理論架構

### 一、語言與方言

台灣人長期以來受國語政策之影響以至於對「語言」（language）與「方言」（dialect）有著刻板印象的誤解，總以為國語（華語）以外的台灣本土語言均為方言。究竟語言和方言有何差別？根據 Crystal（1992:101），方言是指「因文法或詞彙的差異而顯現出地區或社會背景不同的某種語言變體（variety）」。如何判定某二個人所說的話語是語言或方言的差別呢？在語言學上，一般是以他們兩者溝通交談時是否能互相理解（mutual intelligible）對方的話語為判斷的基本標準。（Crystal 1997:25）如果二者互相無法理解則雙方分別使用不同的語言；若即使有些詞彙或文法的差異，但仍理解對方的話語則雙方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底下的二種方言。

儘管語言學上有其標準以區分語言及方言，然而現實上，特別是有政治力介入時，未必以語言學的標準來區分。有些情況是明顯為語言的差異，卻被刻意當作方言看待，譬如國民黨時期將台灣本土語言貶低為方言。另一情形則實際上為方言的差異，但為了突顯政治上的主權獨立而將該方言提升為語言的層次。譬如北歐的「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內所使用的 Scandinavian 語言實為某種程度可互相理解的方言差異，但是他們為凸顯國家的認同而堅持他們所說的話語是語言的差別，分別稱呼他們的語言為「瑞典語」（Swedish）、「挪威語」（Norwegian）、及「丹麥語」（Danish）（Crystal 1997:286）。

何以國民黨時期要刻意將台灣本土語言貶低為方言？因為語言與方言常扮演不同的社會功能，且方言容易成為「高低語言現象」（diglossia）中的低語言。低語言常給人粗俗、沒水準的印象，因較不受重視所以不在正式場合使用，也因此容易讓人覺得即使消失了也無所謂。國民黨將「華語」訂為國語，將其他被支配

---

<sup>2</sup>本文為與發生母語異化的台灣人溝通，暫時以中文書寫。

族群的語言貶為「方言」其實就是要進行政治鬥爭，利用語言來強化支配者的文化優勢，甚至用來打擊被支配族群的自尊心並進一步消滅其自我認同。(施正鋒 1996: 58)

## 二、高低語文現象

「高低語文」是「高低語言」(diglossia) 和「高低文字」(digraphia) 概念的合稱。什麼是「高低語言」和「高低文字」呢？基本上，這是二個概念類似的用詞。「高低語言」主要是指「口語」而「高低文字」則是指「書面語」(也就是「文字」)。

若論到「高低語言」的概念，Charles Ferguson (1959) 算是第一個有系統性地論說diglossia概念的社會語言學家。他將「高低語言」定義做一個語言的二個「語言變體<sup>3</sup>」(two varieties of the same language) 分別擔任不同的社會功能 (social functions) 的語言現象。他又論述道，這二個「語言變體」當中，其中一個扮演「高語言」(High language)、另外一個扮演「低語言」(Low language)。「高語言」通常有較高的名聲和文學傳統，享用較多體制內的資源，而且會用於正式場合。相形之下，「低語言」通常會被看不起，用於非正式及私人場合。

後來，Joshua Fishman (1967) 針對 Ferguson 的 diglossia 概念提出修改，他認為「高低語言」不一定僅發生在一個語言裡面的二個語言變體；也就是說「高低語言」不一定是「語言變體」，也有可能發生在「語言」和「語言」之間，而且語言數目不限定在二個。

那麼，什麼是「高低文字」(digraphia) 呢？Dale (1980:5) 將 Ferguson 的「高低語言」概念延伸到“文字”上，將它定義為「一個語言使用二種（或者以上）的文字書寫系統」。漢學家 DeFrancis (1984:59) 也針對「高低文字」提出類似的定義。後來蔣為文 (Chiung 2003:9) 將 Dale 及 DeFrancis 的定義修改為「一個社會裡頭有一個以上的文字系統分別擔任不同的溝通功能」。蔣為文的定義就如同 Fishman 對「高低語言」的定義一樣，不限定在一種語言的變體。

若引用「高低語言」及「高低文字」的概念來看，漢字文化圈裡面有什麼樣的語言現象呢？先就口語來說，漢字文化圈裡自古以來各地方就有不同的語言，譬如說有廣東話、閩南話、客話、壯話、苗話、瑤話等。因為皇帝使用的語言是當時的標準語，用於教育、行政等正式場合，雖然各地有自己的語言，然而各地的讀書人若想參加科舉考試，就得學皇帝所在首都的語言（或者所謂的口音）。也就是說，那些讀書人平時生活當中雖然是在用他們在地的語言，然而每當吟詩作對、研讀四書五經時就需要模仿首都地方的語音。時間一久，那些讀書人又將他們模

<sup>3</sup> 「語言變體」亦即一般所謂的「方言」概念。

仿的首都語音傳給在地的鄉親及後代子孫。因此形成那些讀書人的在地語言裡頭有所謂「讀書音」(文言音)和「白話音」同時存在的現象。這也是台語裡面有所謂文言音、白話音的由來。若用高低語言來分析,就同一個語言來講,文言音就是「高語言」、白話音就是「低語言」。若就不同語言之間來看,皇帝所用的語言就是「高語言」、各地一般百姓所用的在地語言就是「低語言」。「高語言」因為長期以來用於正式場合和科舉制度,所以讓人感覺較有水準、有學問;「低語言」因為過於平凡,所以感覺較粗俗。像這樣的社會心理其實在目前台灣的社會中還是很普遍。譬如說布袋戲或是歌仔戲的戲劇裡,每當有大俠、文人出現,就會用文言音講話;而若是丑角則用白話。

若就「書面語」來看,漢字文言文就是「高文字」,白話文及其他發展出來的民族文字,例如越南的「字喃」(Chu-Nom)及越南羅馬字(Chu quoc ngu)、韓國及朝鮮的「諺文<sup>4</sup>」、日本的「假名」(Kana)、及台灣的「歌仔冊文字」與「白話字」(P̄h-oē-j.)等均算是「低文字」。漢字文言文因為長期以來均被當作“正統”文字又有科舉制度的體制支持,所以社會大眾感覺使用文言文相對白話文有水準、有學問。這種現象在目前台灣社會仍很普遍,譬如墓碑、祭文用文言文寫生平紀事,廟寺也用文言文寫廟史、對聯,甚至一般人講話、寫作的時候為了展現讀書人的氣質而會引用成語及古詩、古文。

在「高低語文」的社會裡,高語言/文字不一定永遠高,低語言/文字也不一定永遠低,它們的地位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仍有可能變動。譬如日本「假名」、韓國「諺文」及越南「羅馬字」終究於二十世紀翻身從低語言/文字變成高語言/文字。至於那些依附在漢字構字原理而形成的「壯字」、「苗字」、「瑤字」為何尚未爬升為高階語言文字?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文字結構本身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蔣為文 2006)

### 三、個人母語與族群母語

語言學裡有所謂的「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和「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的概念。「第一語言」是指個人出生後第一個學起來的語言,「第二語言」則是指學會第一語言、有一定的歲數後再學會的其他語言。「第一語言」通常是「流利的語言」(fluent language),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形。比如說當前有不少台灣人雖然出生後第一個學會的語言是台語,然而上學後因為學校主要用華語甚少使用台語,導致他們的第一語言「台語」逐漸生疏而不如第二語言「華語」來得流利。

<sup>4</sup> 「諺文」(Onmun)一詞在台灣並無負面的意思,然而在韓文裡Onmun有負面的、粗俗的文字的意思(Taylor and Taylor 1995:212)因此不論在韓國或朝鮮,均不使用Onmun此詞。目前在韓國用Hangul(完美的文字的意思),而在朝鮮則使用朝鮮字(Chosoncha)或者正音(Chongum)來稱呼諺文。Hangul是朝鮮語文研究兼推動者「周時經」(Chu Si-gyong)於1910年開始使用。(Kim-Renaud 1997: 1-2)

若論到母語，其實可以分為「個人母語」(personal mother tongue)及「族群母語」(ethnic language；或者稱為「民族母語」“national language”)二種概念。上述的第一語言就是一般人的個人母語。通常，在正常的狀況下，第一語言不僅是個人母語，同時也是族群母語。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形之下，譬如說留學家庭、移民家庭、受外來政權殖民等，第一語言未必然等同是族群母語。若以受外來政權殖民統治為例，譬如日據時代，在國語政策影響之下長大的台語囡仔反而日語較流利且將日語當做第一語言、反而將族群母語--台語當做第二語言甚至是完全聽不懂。這是個人母語與族群母語不一致的一個例子，而這種「母語異化」的情形通常是族群母語認同開始轉變的初始現象。

#### 四、母語異化與母語轉換

若不提示「母語」定義的狀況下問受訪者的母語為何，通常會得到二種不同觀點的回應。第一，若站在語言是「族群歷史文化傳承功能論」者，即使受訪者的個人母語和族群母語不一致，受訪者仍會根據他的「族群母語」來回答。第二，若主張語言僅是「溝通工具」者，受訪者通常會根據他較流利的個人母語來回答。這也是為何不少年輕的台灣人雖然明明族群母語是台語，但他卻會認為母語是華語。

當一個人的個人母語和族群母語不一致的時候，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母語異化」的現象。母語異化可以分為圖表 1 中的二種情形。第一種「雙語的母語異化」是即使個人母語和族群母語不一致，但他仍具有該二種語言某種程度上的使用能力。另外一種是「單語的母語異化」現象，也就是個人僅保有個人母語的能力卻已喪失族群母語的使用能力；這種情形通常是語言轉換 (language shift) 的前兆，換言之即是族群母語的轉換。當發生單語的母語異化的案例越來越多，量變將造成質變使得這個語言社群的人集體拋棄原有族群母語而認同新的族群母語。

	個人母語	族群母語
(1) 雙語能力	+	+
(2) 單語能力	+	-

圖表 1. 雙語及單語的母語異化情形

單語的母語異化通常會有二個後果：第一是個人仍會在精神上、情感上承認族群母語的存在，然而在實際日常生活中卻僅用個人母語。譬如歐洲的「愛爾蘭共和國」(Irish Republic) 原本是講「愛爾蘭語」(Irish)，然而經過英國統治後卻

變成很多愛爾蘭人僅使用英語而不會說愛爾蘭語。<sup>5</sup>雖然愛爾蘭人於政治上獨立後仍繼續使用英語，然而在民族情感、精神層次上還是將愛爾蘭語當做民族母語（Fasold 1984:278）。譬如，愛爾蘭共和國憲法（1937年版）規定「愛爾蘭語為民族母語（national language）也是第一官方語言。英語則為第二官方語言」。（施正鋒 2002:407; Crowley 2000:5）第二個後果是在精神上、情感上放棄原有的族群母語，將個人母語當做新的族群母語。換一句話來講，族群母語已經產生語言轉換，從A語言變成B語言的「母語轉換現象」（vernacular shift）。發生母語轉換的A族群成員剛開始或許還知道自己是A族群成員後代，然而隨者時間的消逝，卻可能逐漸認同自己是B族群的成員。譬如台灣的平埔族因語言文化的逐漸消失，而逐漸認為自己是較強勢的漢人語言文化的後代。

## 五、語言與認同

語言和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或者國族、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有關係嗎？針對這個問題，通常會有正反二種完全不同的意見。

贊成的人認為語言除了是溝通的工具之外，還是族群歷史文化傳承的媒介、族群自信、自尊和認同的表現；族群母語若是死亡，族群意識也會隨之消退。反對的人總會提那些像愛爾蘭的例子來證明雖然講英語但仍可以維持愛爾蘭人認同。究竟語言和認同有無關係又其關係為何？

語言與認同雖然無“絕對”的關係，然而卻有“相對”的關係。也就是說，語言是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Liebkind 1999:144; 施政鋒 1998:52）。語言對族群、國家認同是不是有催化的作用，須由它存在的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來決定（Fishman 1999:154; Ross 1979:4）。

語言對族群、國家認同的作用可以分為2方面來討論，亦即「強化語言功能」及「弱化語言功能」。「強化語言功能」是指利用族群母語來動員及強化族群認同。譬如選舉演講場上用台語、客語分別來動員台語、客語族群成員。「弱化語言功能」是指不利用族群母語來做族群動員的工具。

有不少研究指出族群母語的消失並不一定會造成族群認同的喪失（施正鋒 1998:55; Edwards 1985:48; Lu 1988:99）。以客家為例，假設有一個客家人（Hak-ka-ngin），雖然他不會講客家話（Hak-fa），但他還是有可能會認同他是客人。這在現實狀況中確實是如此，有不少不會講客家話的人仍認同自己是客家人。有不少人因此就下結論說語言和認同無關係。事實上，雖然「弱化語言功能」仍有可能維持族群認同，但這並不證明“「強化語言功能」無法動員和強化族群認同”

---

<sup>5</sup> 根據Ethnologue (Grimes 1996:489)的資料，1983所做的語言普查顯示僅13%的愛爾蘭人自認自己的愛爾蘭語還很流利。

啊！

「弱化語言功能」就一定能維持族群認同嗎？答案是不一定。族群意識 (ethnic consciousness) 的產生可以分為主、客觀因素 (史明 1992:4; 施正鋒 1998:52)。客觀因素包含血緣、膚色、語言、宗教、風俗、共同歷史記憶等。當族群母語消失時，如果其他的客觀因素，譬如血緣、膚色還存在，當然就有可能繼續維持族群意識。但是，如果語言是現存唯一的客觀因素，族群意識恐怕早晚會隨著族群母語的流失而消逝。譬如台灣目前有不少鶴佬客 (Hō-ló-kheh)，因沒有留下其他顯而易見的可做為區別族群身分的客觀因素，因此隨著客語的消失而失去原來客家意識與認同。蔣為文 (Chiung 2005:369) 針對 244 個大學生所做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即使不會講台語或客語但仍會認同自己是 Hō-ló 或客家族群的主要因素在於家族中 (祖父母或父母輩) 仍有成員使用該族群母語。相形之下，如果受訪者本身不會講，家族成員又沒有人使用，則認同自己是 Hō-ló 或客家族群的比例相當低。由此可見「強化語言功能」對族群認同扮演著正面加分效果。

## 六、土著化與代表性

「土著化」(indigenization) 是指從移民社會 (immigrant society) 變成「土著社會」(native society) 的轉變過程。早期漢人從唐山移民來台灣時，剛開始每逢過年過節便會想要回去故鄉唐山和親人團圓，甚至過世後也想落葉歸根將屍體送回唐山埋葬。這就是移民社會現象，也就是移民者仍存有過客心態，認為唐山才是故鄉、台灣不過是暫時歇腳的地方。但是經過一定的時間和社會文化的發展，那些漢人移民逐漸於過年、過節時不再回去唐山，死後也直接埋在台灣。最後漢人移民就認為自己是在地的台灣人，台灣是他們的新故鄉。這就是土著化的過程。台灣於 1945 年以前的舊住民包含有 1) 南島語系的「原住民」和 2) 平埔族與漢人移民混血的「客家」、「Hō-ló」族群。南島語系的原住民在台灣已經數千冬，早就土著化了。至於客家及 Hō-ló 族群呢？陳其南 (1994:92) 指出在 1683 到 1895 年的 200 多年當中，台灣的漢人移民社會逐漸變成土著社會。換言之，在日本及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之前台灣就已經形成土著化社會。這個土著化社會基礎是「台灣語言」、「台灣文學」、「台灣民族」意識形成的重要因素。

就土著化的角度來看，使用「華語」的新住民 (或者所謂的「外省人」) 有多少比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這些 1945 年以後移民台灣的新住民本來有可能在二、三代內就融入台灣社會變成台灣人，然而因為那些在台中國人的政治操作和動員的關係，導致他們無法度揮別中國認同、阻礙了他們在台灣土著化的發展。這也連帶地影響到華語在台土著化的進程。換一句話講，華語若要在台灣生根發

展、成爲台灣語言<sup>6</sup>的一種，除非他的使用者有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要成爲台灣語言，除了須經過「土著化」過程之外，尚須有「代表性」。代表性是指在台灣的歷史、文化發展當中有適當的主、客觀條件促使該語言具有台灣的主體性、對外可以表現台灣的特色、而且外界也這麼認爲。

若就定義來看可能很難理解什麼是「代表性」，或許可以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譬如當我們講到日本料理，大家一定會想到壽司、沙西米 (sasimih)、清酒。若談到台灣料理就會想到米粉炒、滷肉飯、珍珠奶茶。若想到美國料理就是 hamburger、coca cola。難道台灣人不吃壽司、沙西米？當然有，甚至在夜市都有在賣。但爲什麼沒有人認爲壽司、沙西米是台灣料理？因爲它沒有台灣的代表性！當然，雖然目前壽司、沙西米暫時沒有台灣的代表性，或許幾百年後台灣人將它發揚光大、外界也許會認爲壽司、沙西米是台灣料理。這種情形要發生需要有主、客觀的條件，並不是單方面期待就會實現。總之，可以確定的是至少現階段壽司、沙西米不具台灣的代表性。

### 參、漢字文化圈想像共同體的轉變

就漢字文化圈的成員和漢字發源地中國的政治關係來看，越南、韓國和朝鮮皆曾被中國直接統治過，就算後來脫離中國而獨立，也一直維持和中國的宗藩關係。公元前 111 年，漢朝漢武帝出兵佔領越南，將越南納入中國的直接統治。一直到公元 939 年，南越利用唐朝大亂的時候才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 (Hodgkin 1981)。雖然越南人脫離中國「獨立」，然而越南必須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此情形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 (SarDesai 1992:19)。公元前 108 年，漢武帝征服古朝鮮，設立「樂浪」、「真番」、「臨屯」及「玄菟」四郡。公元 4 世紀，住在鴨綠江南北一帶的「高句麗」人攻佔樂浪郡，結束來自中國的外來統治，朝鮮半島陸續形成「高句麗」(Koguryo)、「百濟」(Paekche)及「新羅」(Silla) 3 個王國；雖然脫離中國統治，大體上仍是漢式制度。公元 668 年，新羅「統一」朝鮮後，積極模仿唐朝制度；後來的「高麗王朝」(918-1392)更確立科舉制度，「中國」的經書

---

<sup>6</sup>本文區分「台灣語言」(Taiwanese languages)及「台灣國民的語言」(languages used by Taiwan's citizens)二詞的意涵。華語、英語和越南語及其他新移民的語言一樣，可以是台灣的國民在使用的語言之一，但都不是具有台灣傳統歷史文化代表性的「台灣語言」。換句話說，只要是合法擁有台灣國籍的人，他們在使用的語言都是「國民的語言」；但並不是所有的「國民的語言」都可以稱爲「台灣語言」。(蔣爲文 2005d) 本論文之所以區分「台灣國民的語言」和「台灣語言」，其思考點正如同有名的政治哲學家 Will Kymlicka (2001)將新移民的「族裔權利」(polyethnic rights)和舊居民的「少數權利」(rights of ethnocultural minorities) 區分開一樣。所有的新移民，不論是出於自願(譬如，自願移民到美國的台僑)或是因戰亂被迫移民(譬如隨蔣介石來台的軍民)，他們都是在移居地已形成一傳統社會文化體系後才加入的新成員。這些新成員在享有「族裔權利」之外，當然有盡「入境隨俗」、尊重舊居民的義務。



變做「朝鮮人」必修的課程，漢字的「正統」地位也在此時期穩固起來（Taylor and Taylor 1995:203, 255-259）。若論到日本，日本從先秦時代就有和中國接觸的記錄，漢朝武帝也曾「賜」日本「漢委奴國王」金印。雖然日本不曾受中國直接統治，但因為漢朝和唐朝的影響力，中國也曾變成日本引進文物制度、模仿的對象。譬如日本於7世紀的時候所進行的「大化革新」就是模仿中國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的開始（Seeley 1991:40）。

漢字文化圈的成員除了政治上受中國支配之外，另外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借用「漢字」、引進「儒家思想」及「科舉制度」。在借用漢字的時候，他們均碰到漢字無法完全表達他們在地語言的問題。於是他們利用「漢字」做「訓讀」、「音讀」，或者造「新漢字」來應付這些問題。甚至後來根據「漢字」的造字原理慢慢發展出自己的新文字系統，譬如越南的「字喃」及「越南羅馬字」、韓國及朝鮮的「諺文」、及日本的「假名」（Kana）。雖然他們發展出自己的文字，然而這些新文字不僅在大中國的政治、文化架構下面很難生存，甚至在自己國家裡面也遭受既得利益的文人統治階級的輕視與打壓。譬如韓國「李世宗」於15世紀中期召集學者研究發明韓國文字「諺文」的時候就有封建文人「崔萬里」等以“一尊華制”為理由上疏反對推行諺文（Lee Sang-Baek 1957）。這種「新文字」附屬於「漢字」底下的情形，延續到19、20世紀，反殖民、反帝國的民族主義蓬勃發展起來後，才逐漸開始轉變（蔣為文 2005b、2005c、2005e；Hannas 1997；趙潤濟 1998）。當韓國、朝鮮、越南、日本進步的知識份子提倡用這種簡單易學的新文字時，一般國民很快就將新文字學起來。當然，民族國家意識也因為讀寫能力及國民教育的建立而形成起來。這就如同西歐國家在近代於宗教改革以後因為民眾讀寫能力的建立連帶帶動國民文學和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一樣的道理（蔣為文 2005f）。

就語言文字和政治關係來看，當代的越南、韓國、朝鮮與日本除了均有獨立的語言文字之外，政治上也是獨立的民族國家。不論是先有獨立的語言文字還是先有獨立的政治，從這幾個國家可看出語言文字和政治密切的共生關係。相形之下，台灣於政治上仍存有統獨的爭議，在語言的使用上也有華語和台灣本土語言的爭論，在文字的選用也有漢字和羅馬字的角逐。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混亂現象似乎表現在對語言文字選用的捉摸不定，而對語言文字的難以取捨也反映出政治上對中國情感的難分難捨。

至於中國，自秦始皇統一漢字、「書同文」以來，雖歷史上曾歷經分分合合，但整體上來說還維持漢字文化共同體。中國境內各民族諸如壯族、苗族、瑤族等雖曾以漢字為基礎發展出「漢字式文字」<sup>7</sup>，可惜這些文字難學、難懂、難以推廣

<sup>7</sup> 有關漢字式文字，可參考周有光(1997:98-146)。

成大眾的讀寫能力，以致於難以透過語言文字形成國民文學建立民族國家意識。這些沒有國家的民族終究僅能成爲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關於漢語的文字改革，中國雖於 1930 年代曾試驗用簡單易學的羅馬字來書寫漢語，進行所謂的「拉丁化」運動（季羨林 1992:245）。但當中國共產黨得到政權後，卻隨即於 1950 年代停止拉丁化運動，改推動漢字簡體化。何以中國要放棄漢語拉丁化？主要就是顧慮到中國政治及文化上的「一統性」（Norman 1988:257-264; DeFrancis 1950:221-236; Barnes 1974）。中國當政者擔心若中國各地用當地語言來書寫，會造成廣東、福建、上海等地的地方意識發展做近代民族國家意識而進一步從中國獨立出去。中國當政者爲了掩人耳目只好以漢字簡體化爲下台階並轉移漢語拉丁化的焦點。

總之，「壯族」、「苗族」、「瑤族」因無法跳脫漢字的迷思導致無法發展出簡單易學的文字系統以進一步發展國民文學。（蔣爲文 2006）相形之下，越南、韓國、朝鮮與日本則因擺脫漢字的羈絆，才得以迅速解構漢字共同體並建構現代的民族國家想像。那麼台灣呢？下節將進一步探討台灣的情形。

## 肆、台灣想像共同體的轉變

### 一、公元 17 世紀到 1945 年

台灣原爲南島語系原住民爲主的部落社會，於 17 世紀時因受西歐國家荷蘭及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關係而被帶入世界舞台。荷蘭人統治台灣期間（1624-1661）爲當時的平埔族語言設計羅馬字書寫系統並建立全台第一所學校（Campbell 1903:147; Heylen 2001; 林玉体 2003:20）。雖然當時殖民者提供的是跛腳的教育系統，但這對當時台灣原住民從無文字進展到文字讀寫時代有著開啓性的貢獻，也爲建立平埔族語爲主的國民文學踏出第一步。可惜，隨著 1661 年鄭成功進軍台灣及其鄭氏政權與後來的大清帝國在台推行漢字文化的結果，台灣逐漸從國際舞台被帶入漢字文化圈。以平埔族語爲主的台灣國民文學及民族意識隨著漢字文化在台的增強與土著化而逐漸消退。

隨著鄭氏王朝及大清帝國的對台統治，漢字文化在台灣二百餘年的發展後逐漸土著化，而成爲台灣本土文化的一部份。由於漢字文化的土著化，台灣也正式被納入漢字文化圈的一員。台灣成爲漢字共同體的成員後，對台灣人欲建立以台灣爲主的民族國家究竟有利還是有弊？若從越南、韓國、朝鮮等其他舊成員的例子來看，除非跳脫漢字、解構漢字共同體的想像，否則均難以建立真正獨立的民族國家。

以越南爲例，隨著「清法戰爭」（中法戰爭）的結束與「天津條約」於 1885 年的締結，清國正式放棄對越南的宗主國地位並承認法國爲越南的新宗主國。當

法國正式成爲越南的新殖民母國後，法國殖民者認爲中國是介於越南與法國間的第三者。爲了讓越南能親近法國，非得讓越南遠離中國不可。爲達到此目標，廢除漢字、讓越南人不容易讀中國書以切斷越南與中國間的文化聯繫就成爲法國者的文化政策（蔣爲文 2005b、2005c；DeFrancis 1977:77）。由於法國殖民者廢除越南的漢字與科舉制度，無形中讓越南羅馬字有發展的空間並協助越南跳脫漢字共同體、爲後來的越南民族國家建立重要的想像基礎。

大清帝國雖然於 1895 年放棄對台的主權，不過因爲佔領台灣的「日本」本身也是漢字文化圈的舊成員，所以對台灣欲跳脫漢字共同體的幫助並不大。若 1884 年當時清國與法國之間爲了越南宗主權歸屬問題所發生的「清法戰爭」延續下去，且法國同時佔領台灣與越南，如此一來台灣的近代史就要改寫、而且台灣有可能用「白話字」（Pêh-ōē-jī；台語羅馬字<sup>8</sup>）取代漢字。

何以說日本統治對台灣脫離漢字文化圈並沒有多大的幫助？雖然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就非常注重「脫華入歐」而且很重視語文改革和國民教育的重要性（Seeley 1991:136-142）。不過，日本的語文改革只明顯提升假名的使用比例，並沒有完全廢除漢字。爲何日本沒有完全廢除漢字呢？因爲自 1931 年日本發動「滿州事件」開始全力入侵中國東北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氣勢如虹。他們爲了紀錄所佔領的中國地名與人名上的實質需要，而反對廢除漢字（Gottlieb 1995:75-88; Seeley 1991:147-148）。

日本佔領台灣期間雖然一開始就有打算推行日本話，但他們對漢字的態度仍稱不上是敵視。日本總督甚至經常舉辦漢詩聯吟大會，招攬台籍文人來官聽吟詩作對以利拉攏台灣人與日本人間的距離（施懿琳 2000:186-187）。日本人就是利用漢字文化圈中漢字的「剩餘價值」來做爲軟化台灣人反抗的工具。這與法國人將漢字當作破壞法國、越南關係的第三者有完全相異的觀點。

因爲日本總督一開始對漢字並不排斥，再加上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使用羅馬字來做台灣話文的書寫工具亦不重視，以至於台灣失去用羅馬字取代漢字來切斷與漢字文化圈關係的機會。譬如說，日據時期最積極推行羅馬字的蔡培火，於 1924 年同化會正如火如荼進行時建議推行羅馬字卻不受重視；蔡於 1931 年對日本官員「伊澤多喜男」遊說使用羅馬字也得不到支持的回應（張漢裕 2000:19-20）。日本總督對漢字的態度一直到 1937 年禁止報紙漢文欄才有明顯改變（葉石濤 1993:59）。可惜自禁止漢文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僅短短數年，對促使台灣跳脫漢字共同體的影響有限。

## 二、公元 1945 年以後

---

<sup>8</sup> 詳細請參閱蔣爲文(2005a)、董芳苑(2004)。

台灣雖然經過日本 50 年統治，不過台灣並未完全脫離漢字文化共同體。雖然台灣仍有漢字文化共同體的特色，不過那又與蔣介石所想像的中華民族或者中國共同體不完全雷同。蔣介石將此差異性怪罪於台灣人受日本的奴化，卻沒有認清「漢字共同體」與「中國共同體」原本就是 2 個不完全相同的層次。因為文化的差異，加上經濟的剝削與政治的壟斷，終於引起台灣 1947 年的 228 起義。

因為 228 起義的教訓，台灣人才覺醒到台灣與中國是相異的 2 個個體。蔣介石也因此體會到必須徹底對台灣人實行中國化政策才有辦法穩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生存空間。蔣介石就一方面利用台灣原有的漢字文化共同體特色，例如使用漢字、崇拜儒學、過舊曆年、中秋、清明等，將他們轉換做中國共同體的想像基礎；另外一方面就盡力斬斷台灣本土化的根，譬如實施國語政策、禁止講台灣語言、禁止使用羅馬字。透過國語政策將殖民者語言「華語」在台的使用合法化與合理化，並故意將台灣本土語言貶低為方言、讓民眾覺得方言消失也不足為惜。透過出版品、媒體宣傳與大中國的教育系統，台灣在短時間內就建立以中華民國為基礎的中國共同體想像。

這個中國共同體雖然於 1980 年代以後遭受嚴重的挑戰，不過至今以台灣為主的想像共同體仍尚未完成。雖然本土政黨「民主進步黨」於 2000 年執政至今已經 6 年，不過台灣派與中國派選舉對決仍是各持一半，甚至還有人跑到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台獨以示效忠中國之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台中國人不認同台灣，一方面也是在地台灣人仍充斥著漢字共同體迷思所引起。

許多政治台獨的人士雖然支持台灣建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在文化上仍認為自己是華人、屬於漢字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這種的「政治台灣、文化中國」的獨立方式其實是「二個中國」、或者「藩屬國」的獨立模式，與日本接收台灣以前所成立的短命「台灣民主國」一樣不會長久。何以說是「文化中國」呢？我們可以近來民進黨政府極力對外推廣華語為例來做分析。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世界各國學習華語的人數也逐漸增加。民進黨政府認為台灣可以搶攻華語教學的市場並成為世界性的對外華語教學中心因而於 2003 年成立跨部會的「國家對外華語文教學政策委員會<sup>9</sup>」，隔年並於教育部底下設立「國家對外華語文教學政策委員會工作小組」（簡稱「對外華語小組」）。根據「國家對外華語文教學政策委員會設置要點」，該委員會有十大任務：1) 規劃及推動對外華語文教學政策。2) 規劃及編輯對外華語文教材事項。3) 規劃及推動對外華語文檢測、教學評鑑事項。4) 規劃及推動對外華語文師資培訓、輸出事項。5) 規

---

<sup>9</sup> 英文名為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Taiwan Languages。相關資料請參閱「對外華語小組」網站<[http://www.edu.tw/EDU\\_WEB/Web/CHINESETEAM/index.htm](http://www.edu.tw/EDU_WEB/Web/CHINESETEAM/index.htm)>。

劃及推動對外華語文網路學習之建置及整合事項。6) 規劃及推動華語文資料庫查詢系統事項。7) 規劃及推動相關學術文化交流事項。8) 結合相關學術機構及民間團體資源，辦理對外華語文教育工作。9) 規劃及推動福臺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之對外教學及文化相關事項。10) 其他有關華語文教育事項。

就此十大任務來看，其實就是在對外推動華語教學，至於台灣的本土語言不過被用來做樣板陪襯罷了。此外，將台灣本土語言刻意放在華語這一框架底下也突顯出其將台灣語言文化放在中華語言文化底下的思考模式。奇怪的是該委員會的英文譯名竟為“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Taiwan Languages”。使用“Taiwan Languages”一詞究竟是要表示華語已經土著化變成台灣語言的一種？還是說該委員會主要是推動台語、客語與原住民語，而華語只不過是拿來當幌子？如果就對外華語小組實際的作為來看，應該第一種說法較可能吧！若果真如此，本土政黨民進黨的漢字文化共同體想像不僅沒有隨著政治解嚴逐漸夢醒，反而更向文化中國傾斜。如果說「政治中國」是過去一慣主張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的中國國民黨的大頭症，那麼「文化中華」恐怕也是自認可以成為華語教學中心的民進黨的妄想症！

我們不禁質疑，華語已經土著化了嗎？華語有台灣的代表性嗎？推動華語究竟對台灣是利多還是弊多？

就土著化來說，儘管華語在台灣正式使用已有六十餘年的歷史，並逐漸發展出在地化的「台灣國語」，但他已經完全土著化了嗎？如果華語已土著化、算是台灣語言的一種，那麼曾經也是國語的日語算不算台灣語言呢？即使台灣人一箱情願將華語當成台灣語言，中國人諸如胡錦濤等會認同嗎？

就代表性來談，當世界各國正當興起一鼓“華語熱”的時候，他們會先將華語與中國還是台灣做連結呢？目前雖尚未有這類調查的具體數字報告，但依據筆者的觀察及間接的數據顯示，華語恐怕會被優先與中國聯想在一起。譬如，根據中國「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sup>10</sup>」所統計 2002 年到中國留學的學生共計 85,829 人，其中 21,055 人攻讀學位、64,774 人為非學位生（譬如語言學習者）。然而，根據台灣教育部電子報<sup>11</sup>第五十一期的報導，91 學年度（2002 年 8 月-2003 年 7 月）來台留學的學生共僅 7,331 人，其中 1,283 人攻讀學位、6,048 人為非學位生。不論攻讀學位與否，到中國留學的學生比到台灣的學生多出十餘倍。可見外國人要學華語時會優先選中國。這情形就如同台灣學生要到英語國家留學時會優先遴選美國、英國一樣，而不會想到英語也是官方語言之一的印度、菲律賓。這說明華語

<sup>10</sup> 官方網站在<<http://www.csc.edu.cn/gb/>>。

<sup>11</sup> 電子報網站<<http://epaper.edu.tw/051/number.htm>>。

與中國是被高度連結在一起的，華語具中國的代表性，而中國才是華語文化的代表者。台灣欲與中國爭華語文化的代表權，無疑是重蹈過去「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一樣的愚蠢與無知！

就利弊來分析，華語越普及對台灣人越有利嗎？不少人認為隨者全球華語市場的擴大，台灣人因會講華語因此將從中獲得不少利基，譬如到海外當華語老師或海外旅遊時可以講華語、免除溝通不良的問題。難道沒有任何弊害嗎？當然有。從商業角度來看，當全球華語市場擴大且台灣被納入該市場後，意味著台灣也要將本身的市場開放給來自中國的競爭者。台灣有可能打贏與中國的華語爭霸戰嗎？舉些例來說，台灣近幾年來外文翻譯書幾乎均由中國的譯者包辦；究竟是台灣人不夠努力還是因為不敵中國的廉價勞力？又，台灣的電視公司為了節省成本而逐漸向中國購買連續劇節目。如此一來，台灣演藝人員究竟是增加還是減少了工作機會呢？臺灣人自認為會講「台灣國語」就可以到海外當華語老師。試問當地教學機構會聘請以中國為標準的標準華語老師還是一口台灣國語的台籍老師？如果就語言文化與國家認同來看，臺灣人如果將華語內化為新的母語將促使台灣人的漢字共同體想像更往中國靠攏，如此一來對台灣的民族國家建構有益嗎？總之，台灣如果要和中國爭奪華語的代表權，不僅“無穩賺”，反而可能因此而再度成為中華文化的邊陲。

## 伍、結論

台灣要建立獨立的文化、避免淪為中華文化的邊陲，就要進行脫漢運動，並推廣已經土著化且具台灣代表性的原住民語、客家台語、及 Hō-ló 台語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本文所謂的「脫漢」是指脫離漢字文化共同體的想像以建立政治及文化獨立的台灣民族國家。脫漢的基本原則是跳脫漢字的迷思以建立在地語言文化的主體性。譬如，對於台灣母語的書寫方式，要揚棄「漢字本字」的迷思才可能替台灣母語文學開創出一條寬闊的大道（蔣為文 2006）。脫漢並不是排斥所有的中國文化，而是拒絕以中國為主體的文化思考模式。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歐美文化一樣，可以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但絕不是她的主體。推廣原住民語、客家台語、及 Hō-ló 台語就是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最佳方法之一。

或許有人會質疑，中國那邊也有人在用閩南語、客語，因而論定推廣台語、客語並無台灣特色。台語、客語有無台灣特色並不是決定在中國有沒有人使用，而是決定在誰具有其文化代表權！台灣因為有主導台語、客語文化發展的實力所以台語、客語有台灣特色。我們可以閩南語在當今中國發展的情形為例來做說明。

筆者於 2000 年底曾去中國「廈門」做田野調查。照理說廈門曾經是閩南語文化的中心<sup>12</sup>，應該可以預期很多人在講閩南語。可是那時筆者所到之處，諸如大街小巷、公共場所幾乎難得聽到廈門人講閩南語，反而聽到的大多數是中國普通話。廈門的唱片行所賣歌曲（北京話不算）大約 95% 以上都是台灣歌手諸如葉啓田、江蕙等人的台語歌。以台語發音的豬哥亮餐廳秀節目在廈門的唱片行也相當普見。這個現象說明台灣已經取代廈門成爲所謂“閩南”文化的中心。由於中國官方以華語爲國家語言文化的發展主軸，而讓台灣有機可乘、取得閩南語與客語的代表權。台灣在取得閩南文化的代表權後更進一步將“閩南”正名爲“台灣”，如此不僅可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更可將她發揚光大傳播到中國閩南及東南亞去。

總之，台灣應避免與中國爭奪華語代表權。台灣人爲了爭奪華語的代表權而試圖將華語內化爲台灣語言實爲不智之舉。當華語內化爲台灣語言後，華語勢必排擠其他本土語言，導致台灣缺乏建立語言文化主體性的主導權。其後果是台灣將成中華文化的邊陲。或許華語和英語一樣可以成爲台灣人的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但絕對要避免華語內化成台灣人的民族母語。

---

<sup>12</sup> 早期傳教士到福建或來台灣傳教時常以廈門爲閩南語的標準音。譬如第一本在台灣印行的羅馬字字典《廈門音新字典》(1913)仍以廈門音爲標準。

## 參考文獻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New York: Verso.
- Barnes, Dayle. 1974. "Language planning in Mainland China: Standardization," in J.A. Fishman, ed. *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 pp. 457-77.
- Campbell, William.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reprinted in 199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Chiung, Wi-vun T. 2003. *Learning Efficiencies for Different Orthograph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an Characters and Vietnamese Roman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Chiung, Wi-vun T. 2005. Impact of Monolingual Policy on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aiwan. in Wi-vun Chiung. *Language, Identity and Decolonization*, pp. 356-86. Taila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Crowley, Tony 2000.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Ireland 1366-1922: A Sourcebook*. NY: Routledge.
- Crystal, David. 1992.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 Crystal, Davi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le, Ian R.H. 1980. "Digraph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No. 26, pp. 5-13.
- DeFrancis, John. 1950.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Francis, John. 1984. "Digraphia." *Word*, Vol. 35, No. 1, pp. 59-66.
- Edwards, John. 1985.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NY: Basil Blackwell.
- Fasold, Ralph.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Ferguson, Charles. 1959. "Diglossia." *Word*, Vol. 15, No. 2, pp. 325-40.
- Fishman, Joshua, ed. 1999.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oshua. 1967. "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 Diglossia with and without Bilingu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32, No. 2, pp. 29-38.
- Gottlieb, Nanette. 1995. *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 Grimes, Barbara F. 1996. *Ethnologue*. 13th ed.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Hannas, William. 1997.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eylen, Ann. 2001.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 (1624-1662)," in Ku Wei-ying, ed. *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pp. 199-251. Leuven: F. Verbiest Foundation and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Hodgkin, Thomas. 1981. *Vietnam: The Revolutionary Path*.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Kim-Renaud, Young-key. 1997. *The Korean Alpha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Kymlicka, Will. 2001.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Sang-Baek, L. D. 1957. *Hangul: The Origin of Korean Alphabet*. Seoul: Tong-Mun Kwan.
- Liebkind, Karmela. 1999. "Social psychology," in Joshua Fishman, e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pp. 140-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 Li-Jung. 1988. *A Study of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aiwan*. M.A. Thesis: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s, Jeffrey A. 1979. "Languag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Howard Giles, and Saint-Jacques Bernard, eds. *Language and Ethnic Relations*. NY: Pergamon Press.
- SarDesai D. R. 1992. *Vietnam: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dentity*. 2nd ed.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 Seeley, Christopher. 1991. *A History of Writing in Japan*. Netherlands: E. J. Brill.
- Taylor, Insup; and Taylor, Martin M. 1995.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PA: John Benjamins.
- 史明。1992。《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作者自行出版。
- 周有光。1997。《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季羨林等，編。1992。《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林玉体。2003。《台灣教育史》。台北：文景書局。
- 施正鋒，編。1996。《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
-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衛出版社。
- 施正鋒。2002。《語言權利法典》。台北：前衛出版社。
- 施懿琳。2000。《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
- 張漢裕。2000。《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台北：台灣史料中心。
- 陳其南。1994。《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第2版。台北：允晨出版社。
- 葉石濤。1993。《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
- 董芳苑。2004。〈台語羅馬字之歷史定位〉《台灣文獻》55卷2期，頁289-324。
- 趙潤濟著，張璉瑰譯。1998。《韓國文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蔣為文。2005a。〈台灣白話字 häm 越南羅馬字 ê 文字方案比較〉《語言認同與去殖民》頁 88-116。台南：成功大學。
- 蔣為文。2005b。〈共同體 ê 解構：台灣 häm 越南 ê 比較〉發表於台灣歷史學會主辦「戰後六十年學術研討會——後殖民論述與各國獨立運動研討會」。台北：台灣會館，5 月 21 日。
- 蔣為文。2005c。〈越南去殖民化與去中國化的語言政策〉《語言認同與去殖民》頁 188-201。台南：成功大學。
- 蔣為文。2005d。「收編或被收編？當前台文系所對母語文學及語言人權態度之初探」，《海翁台語文學》39 期，4-25 頁。
- 蔣為文。2005e。〈漢字文化圈 ê 脫漢運動〉《語言認同與去殖民》頁 2-22。台南：成功大學。
- 蔣為文。2005f。〈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語言認同與去殖民》頁 26-42。台南：成功大學。
- 蔣為文。2006。〈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文化發展 ê 影響〉發表於「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中山醫學大學，4 月 29-30 日。